

略论《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

王启才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利用门客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纂的一部政治书。据其《序意》“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良人请问十二纪”可知，该书写成于公元前241年，就目前所知，这是先秦唯一可确考成书年代的子书。《吕氏春秋》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一次系统汇集、整理和总结，被誉为“先秦晚末采撷百家精英的殿后巨制，杂家一流的管键巨擘”^①，它的成书，达到了战国时期书籍编辑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书籍编辑已逐渐走向成熟。然而，《吕氏春秋》的编辑价值仍为人所轻忽，写文章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甚为寥寥，笔者想就此略陈管见。

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始，《吕氏春秋》一直被划为“杂家”。对杂家之“杂”，有杂存、杂选、杂通等说，笔者倾向于认为“杂家乃荟萃众长自立一家言”之意。与先秦其他诸子相比，《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突出的中心”、“完整的结构”^②，有自己较为独特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今治《吕氏春秋》的学者如王范之、田凤台（台湾）、牟钟鉴、刘元彦、洪家义、李家骧等先生都有所论述，兹不复赘。下面择《吕氏春秋》编辑价值的荦荦大端加以探讨。

—

《吕氏春秋》有明确的编书目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在司马迁看来，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似乎仅是为个人或秦国争面子，但这种看法不够深入，没道出吕书编纂的根本目的。钱穆先生说：“余疑此乃吕家宾客借此书以收揽众誉，买天下人之心。俨然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归诸吕氏。如昔日晋之魏，齐之田，为宾客舍人者，未尝不有取秦而代之意。”^③这种看法也不尽符合事实，吕不韦和秦王政固然有种种矛盾，当时吕不韦有足够的条件和时间取而代之，但无任何夺权的迹象。比较而言，元·陈澧说得公允：“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④依本人看，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有个人、国家、现实、未来的种种意图，用心良苦，可谓一箭数雕。《吕氏春秋》的编纂固然有吕不韦盗名沽誉、牢笼门客、立言不朽、为国争荣、立政讽箴等动机，但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出于解决当时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是为了指导秦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是为了弥补秦国官僚队伍素质的不高进而为秦国作文化上的积累。大而言之，当时秦处于极其关键的转折期，“行将统一，欲定天下”，对于即将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秦帝国，以何种方略治国？“胜非其难也，持之其难也”（《慎大》），如何保持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由此引发出对历史、对人生诸种属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

等的理论问题，都需要回答。再说，随着政治的统一，思想上也必然要求一统，因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执一》）。商贾出身的吕不韦思想是敏锐的，考虑问题是很实际的，他主编《吕氏春秋》就是为了一统思想，为行将统一的秦王朝制定治国方略进而填补秦国无文化积累之空白的。“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为了以史资政，有学者说吕不韦意图编“治国宝典”，可谓一语破的。

小而言之，身为相邦的吕不韦此时虽权势煊赫，门客云集，如日中天，但物多极盛而衰，诚如吕书《知分》篇所说：“天固有衰赚废伏，有盛盈盆息；人亦有困穷屈匱，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不容物理也”。在这转折关头，吕氏集团在国内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刚愎冷漠残暴的秦王“益壮”，政权交接在即，秦王将来听从自己吗？吕氏集团能长保富贵吗？政敌嫪毐羽翼已丰满，一度“事皆决于嫪毐”，吕嫪两大集团的斗争已你死我活，如何压制嫪毐，握牢权柄？这是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所以吕不韦编《吕氏春秋》也是想压过嫪毐、教诲秦王，以求在政权交接之后仍大权在握，保住既得利益。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吕氏春秋》的编纂目的显然是明确而实际的。

《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编书宗旨，即“法天地”以行人事，这在该书的总序《序意》中有着直接的叙述和集中的概括：“……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海颡项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从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法天地”以行人事是实现编书目的的途径，是吕不韦判断“是非可不可”的根本标准，由此推演出《吕氏春秋》的主旨和编辑原则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该编辑宗

旨表明了《吕氏春秋》包罗万象、吞吐宇宙的气魄，大大拓展了古典编辑活动的时空观念和评判视野。

《吕氏春秋》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博大神奇的地域空间，它把天地人贯串起来，大大开阔了古典编辑活动的眼界，不像以往哲学家那样或重天道，或重人道不了解自然，各执一隅，有偏颇之处。《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把天地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举凡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哲学、人生、认识、逻辑、政治、军事、教育、农业、美学等无所不包，诸子百家，无所不采，不仅全面，而且系统深入，有的还从资政角度力求探索出自然或社会的规律，与以往编辑仅局限在儒家经传，仅局限于一个诸侯国（不是从统一天下的角度），仅局限于人相比，可说是全新境界的飞跃。

《吕氏春秋》的编辑主要是想以史资政，以古证今。所以，它重视史的勾勒，如讲到战争、君主、国家、文艺诸问题时，都是从源头讲起，发展的线索明晰，分析较具体深入，这种贯通古今的做法，也是以往编纂著述者所不可企及的，表明了战国末期的编辑活动已突破狭隘具体的时间限制，视野广阔。

《吕氏春秋》虽遍采百家，但不是纯粹抄袭、“述而不作”，而是根据“有利于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这一中心加以取舍甚至改造的，如它继承了儒家的“德政”、“重民”思想，却摒弃了其繁琐的礼节，不切实际的说教；它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它选取墨家“节葬”、“用贤”、“尚俭”之说，却摒弃“明鬼”、“非攻”、“非乐”的主张；它选取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却抛弃其以自然排斥社会的主张等等。《吕氏春秋》中不少词语、材料虽采自诸子，但它们一旦被纳入新体系有的就改变了原义，有的赋予了新意，这显然是一种创造。值得重视的是，有些材料为以往所未有，如《仲春纪·贵生》所引子华子言论，《有始览·应同》所引《商箴》一书，以及上古四篇

农家言等，都不见于先秦他书，价值最大，所有这些可视为对以往编辑活动的一种突破。《吕氏春秋》的这种编纂指导思想，直接影响了《淮南子》一书的编纂，对《史记》编纂宗旨的确立影响也很大。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口号，从他在《史记》中对《吕览》的推崇看，应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吕氏春秋》的启示。

二

《吕氏春秋》的编纂方法是取众出一，集腋成裘。杂家之“杂”表明了该书与他书的不同。“杂”既是它的缺点，也是它的特点，甚至是优点。吕不韦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百家，使得吕书在编纂过程中不囿于一家，而是选择各家精华择善而从，综合改造，力求在此基础上成一家言。《孟夏纪·用众》篇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这段话可看作是对该书编纂方法的生动说明。《吕氏春秋》系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合百家九流之说编辑而成，书中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等家几乎都有涉及，“诸子之说兼而有之”，这说明吕书是“取于众”的产物，但它又决非杂合拼凑、折中综合，因为“集腋”是为了“成裘”，“取众”是为了“出一”，遍采百家之长，融汇贯通，是为了构成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服务。《吕氏春秋》的取舍标准按书中表述就是“一”，“一”就是要求天下一统，“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执一》）；思想文化一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不二》）。这种“为研讨治国之道，达成王者之治”而取众出一、“整齐百家”的意识，“集腋成裘”的编辑方法为《吕氏

春秋》所首创，一直为后人所习用，影响很大。

《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编选标准，即贵公尚信，求实客观。该书博观约取，遍采百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编选标准，就难以成书，更不用说完整系统了。对于这个标准，前人有所评说，如汉高诱说吕书“以公方为检格”^⑤，卢文弨说：“而其为书时寓规讽之旨，求其一言近于揣合而无有。”^⑥《吕氏春秋》为求以史资政，进而达到为即将出现的封建大帝国提供一个理想的治国方案和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之目的，力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客观的历史态度去对待先秦思想文化成果。书中对这一标准多有表述，如《序意》篇说：“循其理，去其私”，又评论说：“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贵公》篇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这些虽是针对君主如何治国平天下而言的，但吕书的编纂目的决定了它也是取舍材料的标准。吕书还崇尚信，认为信是处理人际关系、著书作文的根本原则和要求，如《序意》篇说：“人曰信，信维听”，《贵信》篇又进一步说：“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从这段可知，《吕氏春秋》特别强调信，认为信是为君、为臣、为民、为人的立身原则。吕不韦为取信于天下，使吕书起到资政的作用，首要的是保证所载事情、材料的真实、客观，这样所编书籍才有借鉴意义，所总结的经验才可靠，所归纳阐述的治乱兴衰的思想才有较普遍的指

导意义，所制定的治国方略才切实可行。为尚实求信，《吕氏春秋》还“贵直”，主张“壹行”、“直谏”，强调循名责实（《正名》）、按实求名（《审分》）、反对诡辩淫辞（《淫辞》），指出言意相离的危害（《离谓》）。在方法论上《吕氏春秋》明确提出要“察传”、“察微”、“别类”、“去尤”等。尚实求信使吕书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较为冷静、全面、客观，不像先秦其他诸子那样互相攻讦，各诋其短，如成书时间和《吕氏春秋》较近的《荀子》就对百家之学进行了批判，强调了他们的无知与闭塞：“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这说明诸学派多是从某一方面对世界进行探讨和解释，《吕氏春秋》则不然，为达到融诸家于一炉而阐明治道的目的，它努力跳出狭隘的小圈子，打破门户之见，着眼于百家的长处，如《不二》篇对老聃、孔子、墨翟等十八家列举其学说的特点，各用一个“贵”字加以褒扬，都肯定为“豪士”。吕书不仅能公正客观地对待各家学派，而且能全面公正地论人，如《用众》篇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并举例说尧舜禹汤武那样的圣人也有小恶，不能“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即使是众所周知的暴君，也不是一无是处，“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敢于说公道话的精神很值得称道。《吕氏春秋》之所以成为“资政宝典”，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还在于它有一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精神。吕书的编纂者以“考信”为标准，忠于史实，独立思考，能据理论断，不回避，不掩饰，“放言无惮，为后世所不敢”，全书具有朴实、认真的风格，如《悔过》篇记载秦缪公兴师袭郑，因不听蹇叔忠谏，导致兵败将辱时评论说：“此缪公非欲败于殽也，知（智）不至也。”这是不加掩饰地直刺缪公的短智，眼光浅，没有远见。《去宥》篇直斥秦惠王老朽昏聩、囿于主

观偏见“失所以为听”的过失说：“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以上两例是对秦先王的讥刺，文章直呼其名，直引其事，没有避讳，甚为大胆，足见作者为“考信”所具有的胆略和勇气。对于刚愎自用、自骄专断、贪戾残暴的秦始皇，吕书没有阿谀奉承、恭维回护，而是从统一天下后理想君主的角度大胆地进行批评和规劝，有些话讲得极严肃，尖锐直率，切中要害，如“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骄恣》），这是劝说人主要防止骄傲恣睢的。“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本味》），这是隐刺人主好大喜功，自矜独断，必然危及社稷的。“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颡、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任数》），这是讽刺人主愚蠢、昏庸、无知，无法治理天下的。吕书甚至公开声明要讨伐废除“非君”，这些虽真实而不要命的史实、评论，足见其考信求实之一斑。再者，吕书虽是吕不韦召集众门客所编纂，书中对吕不韦及众门客并无赞誉之词，特别指出的是，该书依旧重农抑商，并没有因主编的身份就抬高商贾的地位。吕书“实用性”的编书目的，“一字千金”的悬赏与自许，汉以后被广泛征引利用的事实，足以证明它编选标准的严格，材料的真实可靠。

三

《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经过有意识地组织安排，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体系性、完整性的书籍。它构思精巧，体制新颖、宏大、严密，在中国编辑史、散文史上开创了新的体例系统，功不可磨。先秦文章发展到《荀子》、《韩非子》已出现命题作文，具有了整章的完整性，但从整个著作看，颇似今天的单篇论文集，篇章之间的严整有序性不足，吕书则不然，它分纪、览、论三大部分，下又分若干小部类：纪12、览8、论6，这种两级分目的形式显然是

一种独创。每个小部类又各有其名，下辖若干篇命题短文：每纪 5 篇（尾末附《序意》一篇，系残文），每览 8 篇（今本《有始览》仅 7 篇，显然失落一篇），每论 6 篇，全书计 160 篇，从外观上看，全书题目定数，篇数固定，编排极为齐整、划一。

从全书的总体结构、三大部分各自的体例、内容及相互关系看：既然《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众宾客编纂的，那么周密的统一规划，密切的分工合作必不可少，编纂体例和写作要求应当很明确，不然，构成不了周密严整的体系。全书以“法天地”以行人事为指导思想，十二纪按“上揆之天”建构，为全书的大旨所在，是纲领性的政论书，60 篇文章大体都是从为政、治天下而言的，八览是按“中审于人”来建构的，主要是围绕为君之道来展开的，六论是按“下验之地”来建构的，大体是讲为臣之理、治国之本的。三大部分各有侧重，自成体系。古人认为天道、地道与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是为了人事，这样，三大部分又紧密相联，形成了一个和谐严整的体系，构思精巧，匠心独运。

从具体篇章看：吕书不少文章构思新奇，论题简明集中，论证角度多样，结构简明严整，多数情况下一篇只提出一个问题，阐明一个观点，有史有论，议例结合，一脉贯串，不枝不蔓，清晰条畅。从篇与篇之间的关系看，以八览为例，每览文章多相贯相连，正如李家骧先生所说：“成组之篇有的两篇连环，有的联袂而起，有的群篇集中，有的前行后继，有的互为表里，有的正反相成”，以至于全书表现出“处处成系统，系统套系统，配套分层的结合”^⑦的特点，从全书看，这种特点以十二纪、八览之文为突出。吕书的这种结构特点，后人评价甚高，梁·刘勰赞为：“鉴远而体周”^⑧，汪一鸾誉为：“纲正而目精，体严而用博”^⑨，许维遹评为“体制谨严”^⑩，程千帆称其：“……系统分明，而书之观念乃定。章进为篇，而更进为书，遂为先秦诸子书最完备之形式。”^⑪它对后世书籍的编纂、对古代散文文体的表现形式贡献大，影响深远。梁

启超说：“《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又说吕书“实千古类书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渊海也”^⑫。可以说，从汉代的《淮南子》、《史记》至宋代的《太平御览》甚至当代散文作品的结构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吕书的影响。

四

判断《吕氏春秋》编辑价值的标准是看它比以前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对后世书籍的编纂提供了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影响如何。从中国书籍编辑史看，先秦书籍的成书时代多不明确，且有一个很长的编纂、润色过程，有些典籍直到西汉刘向整理以前，还没有固定的书名，篇题、编次前后不一，不分章节，缺简多，文字讹误多。从著作者看，独撰、一次成书者极少，多为门人弟子相与编纂，成于众手。比较而言，《吕氏春秋》的成书有明显的进步，虽然它书成众手，是“集腋成裘”的产物，但它有明确成书年代的记载，指导思想明确，有一定的中心，一次成书，书名、三大部分类目、各篇篇名意旨显豁，题目固定，二级分目，篇章整齐划一，体例谨严、系统，考信求实，理事相詮，言辞精审，风格质朴，在许多方面已有自己的独创性，部分地突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樊篱，大大拓展了古代书籍编辑的时空视角，直接影响了《淮南子》、《史记》及历代类书的编纂，在中国书籍编辑史、政论散文文体发展史上，都应占据一定的地位。

《吕氏春秋》是一部合乎历史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著作，它集先秦诸子之大成，是杂家之始祖，开后世有纲领性的私人集体著述之先声。吕书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先秦史料，在秦始皇“焚书”、其所采摭原书所存“十不及三四”的情况下，鉴于其存古之功，对后世政治、学术、书籍编辑等的实际影响，历史上所受的非公正待遇，其编辑价值尤显得珍贵，理应受到重视。

注：

- ①⑦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
- ②洪家义：《吕不韦评传》。
- ③《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
- ④《礼记集说》。
- ⑤高诱：《吕氏春秋注》。
- ⑥《抱经堂文集·书吕氏春秋后》。
- ⑧《文心雕龙·诸子》。
- ⑨汪一鸾：《吕氏春秋序》。
- ⑩《吕氏春秋集释自序》。
- ⑪《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二。
- ⑫《覆毕校本〈吕氏春秋〉》。

作者工作单位：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